

早前校園的民主牆事件，再次觸動中央和特區社會各界的神經。我們相信，即或意見相左，只有透過理性辯論，從而達致相互理解，才是民主社會最可寶貴之處。伏爾泰的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今天仍未失效。

——編者

書寫失敗者的歷史

黃克武的〈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一文(《二十一世紀》2017年8月號)對失敗者抱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作者鉤沉第三勢力在香港曇花一現的政治活動，在國共正統的史書中大概都屬於邊緣的東西，而作者利用當事者、知情人的日記以及近年公開的檔案，將被塵封的一幕歷史及相關人物呈現給讀者，使我們能夠了解到像顧孟餘等一批被遺忘的人物及他們創造歷史的企圖。

黃文敘述的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起和衰退，與1949至1953年間一段變幻多端的歷史相關。大陸政權易手後，國民黨敗退台灣。1953年，東西方冷戰格局明朗化，新上任的美國共和黨政府重新全力支持國民黨。在此期間，既反對蔣氏國民黨，更反對共產黨的不同派系與人物，聚集香港尋求國共之外第三條「自由民主」的政治道路。他們建立組織、出版刊物、進行反對國共兩方的活動，並獲美國支持。其中顧孟餘以其名望被推舉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這些不同派系、不同背景的人雖然因相似的政治立場聚集，但內部仍有矛盾——政治態度的細微差異、對能力人品的疵議，對被收買者的指控、甚至圍繞財務發生的齟齬，不一而足。同時台灣方面加緊監視及分化拉攏，並敦促美國放棄對其支持。而港英政府在國共壓力下也對其政治活動加以限制，最終導致第三勢力運動失敗。他們退出政治舞台後，大多不歸「國」(如顧孟餘去日、美，最終在晚年由美返台)、則歸「共」(如李宗仁、程思遠之返大陸)。有趣的是，當年代表國民黨負責監視與分化第三勢力的雷震，後來成為台灣自由民主的一個先驅性人物。

呂文江 北京

2017.8.8

自畫像史料的價值、陷阱與解讀

近年來民國人物研究尤顯熱門，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新史料的不斷湧現。張玉法的〈民國人物自畫像史料的價值評估〉(《二十一世紀》2017年8月號)一文，即通過對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等史

料分析，指出其對民國人物研究的價值與陷阱。

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均屬歷史當事人的「自畫像」，對研究人物的生平、思想及其所處時代的歷史有着重要意義。透過這些作者的「第一視角」敘述，我們得以窺見他們內心世界和心路歷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重回「歷史現場」，感知更真實的歷史情境。然而，這些自畫像往往又暗藏玄機，研究者如不加警惕，便容易落入歷史人物布下的陷阱而不自覺。以日記為例，因時間跨度廣、內容較私密等因素，一般被視作人物研究的重要依據，但記錄者的立場與秉性、記日記的目的、對記錄內容的取捨、記錄方式和寫作風格等均因人而異，其中所反映的「事實」因而千差萬別。而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這類自畫像史料呈現的則是「現在架構的自我」，是對自我形象的重塑。由於種種原因，作者在自我形象重塑的過程中難免存在不同程度的美化或隱瞞，摻雜了各種後見之明或主觀偏見，往往導致所述內容的混淆與失真，令研究者真假難辨。

張先生認為，研究者必須對自畫像史料的種種陷阱有所警覺，注意參考和對比其他材

料加以綜合分析，力求從零碎的資料中拼湊出歷史真相的全貌，但他並未就史料解讀方法進一步展開論述。筆者不揣淺陋，提出幾點個人看法，以拋磚引玉：一、要以貫通的眼光考察自畫像史料，將其置於歷史的整體脈絡之中，不能孤立解讀、用作研究某人的全部材料；二、研究歷史人物，既要觀其言，更要察其行，不僅要看他說了甚麼，還要看他沒說甚麼，探究其言外之意和未言之思；三、注意借鑒和吸收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自畫像史料進行不同角度的解讀，如後現代主義史學將史料視作文本，強調探討史料與語境、文本與敘事之間的關係。心理史學主張從心理分析的視角出發，探尋歷史人物的心靈世界及其行為邏輯。凡此種種，應對我們有所啟示。

朱夢中 昆明
2017.8.10

冷戰電影給建國初電影史研究的啟發

許維賢的〈冷戰電影與「真理運動」：新馬的個案〉（《二十一世紀》2017年8月號）一文，梳理與論述二十世紀40、50年代興起的電影界冷戰運動，其觀點給人新穎之感。當年在共產主義世界的未來革命指導權劃分中，蘇聯共產黨主導歐洲和北美洲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主要負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東南亞地區形成的共產黨力量，必然聽命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安排。與此同時，美國針對亞洲尤其是東南亞諸國的政治宣傳名為「真理運動」，其

宣傳內容無外乎涉及西方世界的價值觀、人生觀等。由於電影普及性高於其他文學藝術形式，遂成為美國外宣的重要形式。

許維賢選擇《小村烽火》、《星嘉坡故事》影片為分析對象，發現從電影腳本的生產到拍攝和上演，都充滿着意識形態的宣傳。這種研究思路也為中國大陸學者重新思考建國初期的電影生產提供啟發。例如，最近披露的上甘嶺戰役相關材料和電影《上甘嶺》（1956）有本質的區別。而《榮譽屬於誰》（1950）為甚麼沒有被批判，反而是《武訓傳》（1950）、《我們夫婦之間》（1951）電影被大批特批，從側面證明了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宣傳中的政治篩選。

袁洪權 綿陽
2017.8.16

隔海評價蔣介石治台

對於蔣介石的治台評價，學界已少有學術論文，特別是當今台灣新聞充斥着整肅國民黨、追討黨產、毀損蔣介石雕像、修改歷史課綱，以及國民黨內鬥的報導。楊天石在蔣介石研究上用功最深、著述最勤，其〈台灣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及其「革新」實踐〉（《二十一世紀》2017年8月號）一文隔海評價蔣介石治台，令人感受深刻。

1950年前後，中華民國政府正值風雨飄搖之際，除去經濟崩潰、民生怨對外，政府的政令不行、軍隊潰散、外援斷絕，各國所等待的只是在適當時機承認新政府而已。此時對於幾年前還是二戰時期盟國領袖之一的蔣介石來說，當是其

一生最大的打擊與羞恥。蔣介石在1950年前後，重讀〈民生主義〉與中共文件，作為改革與自省的起點，而後將改革精神逐漸落實在土地與賦稅改革、地方自治與縣市長民選、發展科學與重用科學（專業）人才、教育與為民服務等方面。楊天石在文章結尾特別點出，現時的台灣歷史似乎太過強調蔣經國對台灣發展的功績，但是細究蔣介石在台的諸多建設，其實已為後來的經濟起飛打下基礎。蔣介石在任時，固然有威權和嚴酷鎮壓，不公不義之事多有發生，但是台灣歷史的寫作趨向「去蔣化」，不提蔣介石的建設與貢獻其實是抹殺歷史。

楊文廣泛檢視了蔣介石晚年在台灣的建設，但還有一處尚可補充，就是蔣介石對軍隊方面思想的變化與改革。蔣介石赴台後在軍事上變革甚多，均是與充實國軍，加強控制軍隊和對付中共為目標。現舉其大要如下：先是1950年初成立「白團」，募集日本軍官教育與訓練國軍高級軍官；同年將「國防部政工局」擴編為「國防部政治部」，以蔣經國擔任主任；1951年成立「政工幹部學校」；1957年展開研發核武的「新竹計劃」；1950年代中期起秘密籌措反攻戰略（後訂名為「國光計劃」）；而相傳1955年的「孫立人案」亦與蔣介石收掌軍權有關。相信以楊天石對民國史料與蔣介石的了解，當可將蔣介石的軍事變革另文論述，以有益於更全面的評價。

王成勉 台灣桃園
2017.8.16